

沙達特遇刺事件與中東未來局勢

石樂三

十月六日，埃及總統沙達特在慶祝中東十月戰爭勝利閱兵大典中，猝然遇刺殉難，舉世為之震驚！這是在費瑟國王之後又一位阿拉伯元首遇刺的不幸事件發生。

沙達特熱愛和平，曾主動推展中東和平外交，贏得了世人的推崇。埃及乃一政治大國，擁有一五十萬大軍，實為中東安危之所繫。如今沙達特突然遇難，不但使埃及失去了領導中心，而且深深影響中東的安全與和平。

新當選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是否能負起安定國內的艱鉅責任，完成沙達特的和平未竟之志，仍為世人所關注。

一、戰爭與和平英雄——沙達特

在開羅郊外沙漠上沙達特的墓碑上雕刻一句輓詞曰：

「爲了原則而犧牲的戰爭與和平英雄——沙達特總統。」

維護正義，堅持原則，是政治家的風度，也是其應具備的重要條件。沙達特爲堅持正義原則，曾不顧毀譽成敗，而冒險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間隻身進入了耶路撒冷，受到了以色列朝野上下的熱烈歡迎。他在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時指出，在中東四次戰爭中，不知有多少財物被摧毀，更不知有多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子弟喪生；但戰爭的結果，只有增加民族間的仇恨而已。他呼籲：「停止戰爭，勿再白白流着我們下一代的鮮血，而唯有實現和平才能解除相互間的積怨，延續兩大民族之間的歷史文化……」

戰爭與和平，是息息相關的。對埃及來說，倘若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中，埃及軍隊不能越過蘇彝士運河，攻佔以色列的堅固巴萊夫陣地（Bar Lev Front），沙達特決不敢進入耶路撒冷，並主動向以色列謀求和平。然而，在中東第四次戰爭爆發之前，任何戰略家不敢相信，埃及有能力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因為當時制空權絕對操在以色列手中；再加上沙達特總統偕同空軍總司令穆巴拉克於一九七二年訪俄時，克里姆林宮曾拒絕給予埃及任何「攻擊性」武器的要求，跟着，沙達特斷然採取了報復手段，驅逐了一萬五千多名蘇俄軍事顧問。在強敵的軍事優勢下，埃及竟然在十月戰爭中贏得了勝利，一般戰略家認為是奇蹟。

戰爭結束以後，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遂行展開了中東「穿梭」和平外交，奔走於開羅、泰拉維夫、大馬士革、利雅德之間，首先促成了美國與埃及的復交；繼而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埃及與以色列簽署了軍事「隔離協定」（Disengagement Agreement）；五月敘利亞與以色列達成了同樣協定。一九七五年八月，在季辛吉的持續斡旋下，埃及與以色列又達成了撤軍協定，以色列同意從西奈半島部份撤軍，以交換美國對以色列提供大量武器；同時埃及也同意美國在西奈隘口派駐軍隊，以監視埃及軍隊對以色列的襲擊行動。

一九七八年九月，卡特總統邀請沙達特總統及比金總理訪美，並在大衛營舉行了三國高峯會議，結果達成了一項大衛營和平協定。依照協定：埃及與以色列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簽署了一項和平條約，以色列同意在條約經國會批准後三年以內全部撤出西奈半島，並將其主權無條件交還埃及；同年五月，埃及雙方在美國直接參與下，開始第二階段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但由於比金政府一直採取強硬路線，而且排除了任何給予巴勒斯坦人的「完全自治」權利，這顯然違反了大衛營協定。沙達特原來希望卡特政府能對比金施加壓力，使其改變蠻橫態度，卒成泡影，終於一九八〇年五月沙達特被迫中止這項自治談判。

沙達特生前，信守諾言，堅持原則，始終以「和平」為其奮鬥之目標。一九八一年八月初沙達特應邀訪美時，曾向雷根鄭重提出恢復大衛營協定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的要求，雷根立刻首肯，而於九月二十三日在開羅恢復談判，美國在談判中仍扮演直接參與的重要角色。如今，沙達特不幸遇難，未能親見和平的到臨。所幸其繼承者穆巴拉克已表示埃及將遵循沙達特的和平路線，但是他強調^①，持久的和平應包括巴勒斯坦人的自決，以及以色列歸還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能否做到，要看美國準備對以色列施加多少壓力而定。

不可否認地，沙達特是位「有信仰、有主義、有原則」的政治家。他能善自利用宗教的犧牲精神，以及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革命鬪志，來對以色列強敵發動了「決定性」戰爭，並恢復了阿拉伯民族的自尊心；他更能體認宗教的寬大容忍精神，堅持和平原則，毅然決然的中止戰爭，爭取光榮的和平，這是沙達特獨具的政治家風格。正如季辛吉在一篇紀念沙達特論文中所說

註^① Cairo, Egypt, Oct.13, 1981 <UPI>.

(2)：「我們在和平旅程中失掉了一位夥伴，我們將單獨努力以赴；但任何人不能忘掉我們在和平旅程中不會找到像沙達特這樣有遠見的政治家了。」

一、沙達特遇刺背景與導因

沙達特遇刺的背景，揣測紛紜：有者自稱是埃及解放組織份子所下的毒手；也有說是外來的陰謀，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就指控莫斯科提供情報，而由利比亞執行這次行刺事件。他強調說⁽³⁾：「倘若早對利比亞加以注意嚴防……如今沙達特可能仍會活在人間。」季辛吉所持的理由是，沙達特生前即曾譴責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有謀殺的陰謀，並將所派的兇嫌加以逮捕。

惟據埃及國防部長阿布·葛扎拉將軍（Gen. Abu Ghazala）稱⁽⁴⁾，沙達特是由四名參加檢閱行列的軍人向閱兵臺拋擲兩枚手榴彈，並用半自動機槍掃射致死，且經查明行刺的首領是名陸軍少尉伊斯蘭布利（el-Islamabony），這名軍官及四名兇嫌均遭逮捕，仍在拘押受審中。他又稱，目前還看不出有任何謀殺組織或其他國家如利比亞的參與行動。

這名少尉軍官來自狂熱的伊斯蘭基本理論教派（Islamic Fundamentalists）的家庭，並參加一個激烈派的「懺悔與遷都」組織⁽⁵⁾（Al Taqfir Wal Hijra-Atonement and Holy Flight），這一組織與狂熱的「回教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相聯合，其精神領袖柯特布（Sayyed Kotb）會謀害埃及已故總統納瑟，而於一九六五年被處死刑。柯特布的門徒穆斯塔法（Shubry Mustafa）於一九六五年創立了這一組織，嗣因刺殺埃及宗教部長，穆斯塔法及其四名門徒被處絞刑，但其組織迄今依然存在⁽⁶⁾。

究竟為什麼原因這些瘋狂的回教基本理論教派軍人對沙達特下此毒手？

埃及是歷史古老的國家，開羅是阿拉伯文化的搖籃。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阿拉伯回教文化逐漸式微，但至今開羅尚存有一所歷時一千年的愛茲哈大學（el-Azhar University），回教世界的宗教學者多出身於斯校，足可代

註(2) London Times, Oct. 12, 1981 "Anwar Sadat, the prophet we took for granted" By Henry Kissinger.

註(3)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 19, 1981, p.27.

註(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14, 1981-Cairo, Oct.13 <AP>,

註(5) 「懺悔與遷都」一詞，純係宗教術語，「懺悔」是向上帝求恕，「遷都」係指回教先知穆哈默德由麥加（Mecca）逃出，而在麥地納（Medina）建都，最後凱旋返回麥加，終於完成了伊斯蘭大業。

註(6) Newsweek, Oct. 19, 1981, p.20.

表阿拉伯回教文化的象徵。

自一九七〇年沙達特秉政以來，埃及政治、經濟經過了重大的變革，從納瑟時代的社會主義轉變為「門戶開放」政策，而使埃及經濟有「突發性」進展，這種突發性的經濟繁榮情勢，反而給埃及帶來了激烈的通貨膨脹，住屋的嚴重短缺，以及中產階級的不滿。這種後遺症當然與沙達特的熱中西方生活方式有直接關連。

由於埃及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固守回教文化的宗教勢力抬頭；再加上伊朗何梅尼的宗教革命成功，及其不斷的輸出宗教革命理論，愈使激烈的伊斯蘭基本理論教派的反動勢力增強。例如：在開羅市區到處可以看到愈來愈多的婦女智識份子，開始穿着傳統的回教服裝，戴着頭巾和面紗，可見埃及有重返保守的宗教社會的趨勢。儘管沙達特相信埃及不會出現另一個「何梅尼」，因為埃及絕大多數人民支持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厭惡不進步的宗教封建社會；但是，有些觀察家預測，沙達特總有一天可能會重蹈巴勒維的覆轍。這項預測不幸而言中，沙達特卒因傾向西方文化而喪生。

另一因素是埃及與以色列簽訂和約，引起了狂熱的回教份子反感，始懷有加害於沙達特的惡念。自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結束後，沙達特改變了親蘇俄路線，而轉向親西方政策，這項政策的改變，獲致了反共的埃及人民普遍的支持，同時也促成了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合作。由於埃及是中東的政治大國，為兩超強所必爭，埃及竟然改變其外交路線，自然會影響蘇俄在中東的均勢地位。

卡特政府利用這項優勢，曾促成沙達特總統與比金總理達成大衛營協定，埃及且與以色列簽訂了和平條約。雖然埃及藉此條約收復了失土，但是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中遭到了嚴重挫折，徒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於孤立無援絕境，而終於導致了沙達特被刺的慘劇。

其實，大衛營協定第一階段談判的失敗，並非沙達特的過失，而是比金一再違反協定的錯誤，尤其卡特政府一直不肯迫使比金遵守大衛營協定，坐視失去了中東和平的良機，並喪失了美國在中東的信譽。卡特的一誤再誤，却引起了國際輿論對美國的抨擊。最近一位美國專欄作家路易斯（Anthony Lewis）在紀念沙達特的論文中略稱^⑦：「沙達特總統的偉大，是由於他的過人眼光與親切的情感。沙達特的和平理想，在近代史中只有戴高樂堪與媲美；然而，沙達特的和平構想，既遭到阿拉伯人特別是巴勒斯坦人的唾棄，又遭遇比金不應有的種種阻礙，更未獲得卡特的誠意支持。沙達特反而相信卡特是他的摯友，定能利用其影響力說服比金對和談的讓步；但事實正是相反的。」凡此種種都是促使沙達特被刺的重要因素。

註^⑦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9, 1981 "Sadat's Unsupported Role." By Anthony Lewis.

三、沙達特遇刺的影響

沙達特的遇刺事件發生後，埃及國內已發生流血暴動案件，同時埃及與蘇丹正面臨強鄰利比亞的嚴重威脅，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蘇俄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均勢，也將發生重大的影響。

在沙達特被刺後第二天，開羅以南三十五英里的阿斯猶特城（Assyut）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行動，一羣狂熱的回教暴徒進攻地方治安機構，造成了兩百多名的傷亡，幸經軍事當局及時派軍敉平了這次暴動。跟著，又在金字塔附近發生小規模的暴亂，當即被治安人員所制服。這兩樁叛亂事件，開羅安全當局已證實純係回教基本理論教派所策動，旨在推翻政府而冀圖建立新的「埃及伊斯蘭共和國」。

不數日，開羅機場發生爆炸案件，一架馬爾他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型飛機經過利比亞的黎波里抵達開羅機場，立即有兩個手提箱內所藏的定時炸彈發生爆炸，幸僅一人喪生。當經埃及當局斷定，這架飛機在的黎波里過境檢查行李時，即被利比亞情報員把炸彈置於手提箱內。利比亞的這項陰謀，是在擾亂當時埃及正在舉行中的全國投票選舉總統。

由於暴亂事件帶來的動盪不安，埃及新總統穆巴拉克遂下令逮捕了八百至一千名的政治嫌疑犯，其中包括七千名回教基本理論教派及其他企圖陰謀推翻政府的激烈份子。此次被逮捕的嫌疑犯，是根據沙達特被刺前所列的名單，其中包括七千名回教基本理論教派及其他企圖陰謀推翻政府的激烈份子^⑧。

在強鄰利比亞的威脅下，埃及與蘇丹早已感到惶恐不安。沙達特在世時，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憑藉蘇俄的新式武器，曾經數次向埃及挑戰，一度引發了利、埃邊境的衝突，卒被埃及軍隊所擊敗。沙達特遇刺後，利比亞軍隊趁機再度陳兵於埃及與蘇丹邊界，利比亞空軍且對蘇丹邊界村莊空襲，造成了重大損失。據最新外電報導^⑨，埃及主要報紙提出警告，在數天內，「埃及將與利比亞發生決定性的對抗」，而且政府當局又逮捕二百三十名回教狂熱的軍人，以及軍隊中的一百三十名不滿份子，以加緊其內部的安全控制。

在另方面，蘇丹第一副總統兼國防部長卡里爾表示^⑩，利比亞領袖格達費已下令在蘇丹與查德接鄰的西部邊界，集結裝備着精密武器的部隊，利比亞對蘇丹的威脅已迫在眉睫。他說，格達費的目標，是在推翻蘇丹努邁瑞政府，並正從兩方面進行達此目的。
註^⑧ London Times, Oct. 17, 1981 "Egyptians launch another purge of extremists" From Christopher Walker, Cairo.
註^⑨ Cairo, Egypt, Oct. 19, 1981 <UPI>.
註^⑩ Khatum, Sudan, Oct. 19, 1981 <UPI>.

標：一方面在邊界集結軍隊，待機發動突襲，另方面在蘇丹內部進行顛覆活動。

格達費的軍事計劃，完全由蘇俄所策動，因爲推翻溫和派的努邁瑞政權，將使蘇俄支持的部隊控制遠自西撒哈拉至紅海及印度洋地區，有效控制西方國家的油輪在紅海的航道，並威脅埃及蘇彝士運河的東岸及波斯灣的油田。必要時，蘇俄更可從阿富汗南下攫取波斯灣油田。

雷根政府鑒於蘇俄的野心，在沙達特遇難之後，立即採取了緊急措施，一則在地中海加強第六艦隊的戒備，二則派遣兩架早期雷達偵察機（A W A C S）到埃及西部與利比亞的邊界，偵察利比亞的軍事活動。爲強調國際對非洲東北角的緊張情勢的關切，美國以更多的武器加緊提供埃及與蘇丹使用，並決定於十一月派遣四千名軍隊前往埃及參加軍事聯合演習。這項演習預定包括阿曼、蘇丹、索馬利亞在內，顯示美國戰略家有採取包圍利比亞、衣索比亞、南葉門的態勢。

蘇俄在沙達特遇刺後展開了宣傳攻勢，強烈抨擊雷根政府干涉他國內政，以及美國正加緊在中東的戰備；並指控華盛頓對埃及與蘇丹的加緊軍援，無異是一種危險的玩火行動。莫斯科的輿論反應集中在四點論調上：(1)蘇俄審慎地表明其欲重新參與和平解決中東爭端的意圖，並且向美國表明，埃及情勢的發展，絕不可影響蘇俄在此地區的安全利益。(2)美國不但失去了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關鍵性盟友，同時也失去了其緩和以色列的姿態，以及維持美國在中東的強力領袖地位。(3)儘管埃及新領導階層再三表明將持續沙達特的親西方路線，但他們仍希望與美國保持相當距離，以及加強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4)莫斯科輿論強調，目前阿拉伯國家希望開羅新的領導階層能使埃及重返阿拉伯聯盟，只要埃及肯廢棄其與以色列所簽訂的和平條約。

的確，沙達特之死，美國喪失了一位忠實盟友，及其強有力的和平夥伴。如何能重新結合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力量，而使埃及能重返阿拉伯國家的陣容，並減少埃及國內狂熱的回教基本理論教派所加諸穆巴拉克的反抗，這是雷根政府穩定中東局勢的急務。

四、穆巴拉克面臨重大考驗

沙達特十月六日遇刺後，依照憲法規定，埃及臨時政府隨即成立，並由國會議長出任臨時總統，穆巴拉克仍留任副總統。七日，埃及執政的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隨即提名穆巴拉克爲新總統候選人，當經國會投票一致通過。十三日，舉行全國公民投票的結果，在一千一百多萬的選民中，穆巴拉克贏得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壓倒性勝利，遂當選爲埃及第四任總統，而於十四日宣誓正式就職。

穆巴拉克現年五十三歲，出身於埃及空軍官校，曾在莫斯科接受飛行米格機訓練，返國後一直擔任空軍職務，一九七三年晉

升空軍總司令，在中東十月戰爭中建立了奇功，奪回了蘇彝士運河東岸的以色列強固陣地，贏得了「戰爭英雄」的榮銜；一九七五年四月，一躍而為埃及的副總統，如今當選總統，兼任執政的國家民主黨秘書長、內閣總理及三軍統帥等要職。穆巴拉克對沙達特推崇備至，說他的勇敢、睿智、率直獲得了墓誌銘的「戰爭與和平英雄」殊榮。同時穆巴拉克在沙達特葬禮中所表現的嚴肅與鎮靜的儀態，也充分顯露在開羅的電視機上，已使埃及的觀眾們對他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所以才獲得了公民在複決投票中的全力支持。

這位新總統頗具軍人風格，在日常生活中，他強調「紀律與自制」的重要性，並主張堅苦勤奮的精神，他平時平均每日處理十六小時的公務。他在六年半副總統任內，經常代表總統主持黨政軍重要會議，以總統私人代表名義訪問各國，且在沙達特遇刺前不久曾訪問華盛頓謁雷根總統，並與國務卿及國防部長舉行會談，他的外交才華深獲華盛頓的欣賞。穆巴拉克在宣誓就職時宣稱，他將努力維護憲法與法律的尊嚴，以及國家領土的安全；同時他保證今後將遵守所有國際的承諾，繼續沙達特沒有走完的旅程。

然而，這位新總統所面臨國內外的問題甚多，其主要包括下列各點：

●經濟問題 自從埃及重開蘇彝士運河，收復西奈油田之後，國家歲收倍增，而觀光事業之日益發達，更使埃及經濟逐漸趨於好轉；但是，由於埃及人口的過剩，可耕的土地面積有限，其生產力決不能維持四千二百萬人口的生計，致使失業者與日俱增（約佔勞動力百分之二十五），通貨膨脹率日漸增高（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⑪；更由於沙達特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執行偏差，造成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因此，中層階級及貧苦大眾多對政府感到不滿。

●軍人問題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以來，納瑟與沙達特所領導的「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一直成為埃及軍隊的核心。可是，由於埃及實行徵兵制，其兵源多屬農家子弟，也有許多來自狂熱的宗教家庭。對於這次行刺案件，儘管開羅宣布並無任何政治團體或外力介入，但是外電報導是由一名供職於情報單位的上校「自由軍官」所策動，而這名校官也是屬於回教基本理論教派份子^⑫。又有一名在貝魯特電話中自稱是槍殺沙達特的兇手，他屬於「埃及阿拉伯解放反對陣線」份子，也是「自由軍官」之一員。該組織係由前埃及參謀長沙茲里中將（Lt. General el-Shazli）^⑬所領導，旨在推翻沙達特政權。由此可見埃及軍中似有不穩的跡象。

註^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15, 1981 "Sadat and Egypt: Economic, Religions Fleet of Clay" By Henry F. Jackson.

註^⑫ New York, Oct. 22, 1981 <Reuter>.

註^⑬ 沙茲里將軍是前埃及參謀長，也是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的英雄，因與沙達特不睦，被調任駐歐使節後，逃往利比亞，從事反沙達特活動，沙達特遇刺後，更極力贊揚兇手為愛國勇士，並呼籲埃及軍中粉碎沙達特與猶太民族主義及西方帝國主義所締結之聯盟。

● 宗教問題 埃及國內的宗教派系甚為複雜，在本文前節中已加說明。觀察家評析，埃及回教團體的活動固然對其政局影響頗大，但是，對開羅政權最具威脅的是回教團體的領導階層，他們都是非常年輕，而且日趨激烈，尤其在大學校園內極為活躍。過去，這些回教團體都是自發性的活動，並缺少有系統與規律的領導機構，但現在却有顯著的變化。據一位開羅大學教授伊布拉欣分析，經過仔細的思考，他才相信，埃及的回教狂熱團體多屬「回教兄弟會」的分支機構，而兄弟會的組織也經過了秘密的改組，其活動的力量與範圍增大，不僅對埃及的政局發生重大影響，同時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敘利亞也將構成更大的威脅。

● 邊界問題 素有蘇俄「兵工廠」之稱的利比亞，一向與埃及、蘇丹兩鄰邦處於尖銳的敵對狀態，而在這次沙達特遇刺事件中，利比亞強人格達費被認為是嫌疑最大的策劃者。事件發生後，利比亞大軍隨即陳兵於利、埃與蘇丹邊界，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最近利比亞外長歐貝廸揚言，利比亞有權對「任何恐怖主義陣地」發動他所謂的防衛性攻擊。這是針對其鄰國蘇丹所發出的警告。然而，歐貝廸又說，利比亞無意攻擊這一地區內任何國家，而且保證利比亞軍隊將從蘇丹與埃及邊界地區撤退；相對地，蘇丹也表示無意與利比亞作戰。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則要求利比亞從查德撤軍，並主張設置緩衝區由泛非洲國家組織和平軍隊援防。

● 和談問題 以、埃、美三邊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曠時歷久，一直未獲任何進展。沙達特生前，曾堅持遵守大衛營協定，給予巴勒斯坦人「完全自治」，但比金則持相反立場，主張只給予巴勒斯坦人「半自治」的有限權利，南轅北轍，任何人似乎對談判不抱任何希望。

在沙達特遇刺前僅四十八小時，以色列比金內閣及世界猶太民族主義組織發表了兩項政策聲明，這兩項聲明無異對沙達特的繼承者投下了一顆定時炸彈^⑭。

、福利、稅務及工作計劃。

以色列內閣聲明^⑮：關於將約旦河西岸的軍事政府轉移巴勒斯坦人自治政府一節，內閣認為，這項提議事實上不及原來所預示的效果，故以色列軍政府仍將控制西岸，但以色列文職人員得以替代中級軍官，處理以色列佔領區內一切有關住居、衛生保健

註^⑭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9, 1981 "Sadat successor faces hardening Israeli line." By Geoffrey Godsell.

註^⑮ Ibid.

註^⑯ Ibid.

屯墾區。

面對以色列的這樣嚴重挑戰，穆巴拉克重申^⑯，埃及將加強努力使其與以色列之間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能够成功；但是，埃及將不對以色列作任何讓步，而且堅持沙達特的政策與原則，不放棄阿拉伯人的任何權利。

五、中東局勢展望

中東局勢，變幻莫測，至爲險惡，一九七八年伊朗之政變，一九七九年兩伊之戰爭，一九八一年黎巴嫩境內以色列與「巴解」組織之戰爭，都給中東帶來了極度的不安；而這次沙達特的被刺殞命，又給中東和平前途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中東未來局勢如何演變？究竟能否避免一場新戰爭的爆發？至少將取決於：埃及國內的安定，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和談，以及美國對和談的立場與行動。這三項要素是相互關連的，而缺一不可的。

先就埃及情勢而言，新當選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宣誓之後，立即主持首次內閣會議，決定保留故總統沙達特時代的內閣陣容，未加任何變動，並在四位副總理中指定莫希定博士（Dr. Fuad Mohieddin）爲第一副總理，負責主管新聞、地方政府及古老的愛茲哈大學等三大部門工作。總理一職仍由總統兼任。穆巴拉克保證，追隨故總統沙達特路線治理國事，並重申對宗教極端份子將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位新總統保持內閣原有的陣容，顯示他的穩重及開明作風，實爲團結內部的明快措施。

更引人注視的，是埃及三軍的態度問題。但是，從穆巴拉克的政治背景看來，他於六年半前被沙達特擢升爲埃及副總統時，正擔任空軍總司令職務，同三軍高級將領一直保持密切關係。一般預料，穆巴拉克就任埃及總統後，將會獲得三軍的合作與支持。沙達特遇刺後，埃及三軍首長立即保證，「誓將排除所有的威脅，竭誠效忠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與安全。」

次就埃及和談而言，過去埃及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中，始終堅持大衛營協定給予西岸及加薩走廊的居民「完全自治」，以便恢復巴勒斯坦人民應享有的權利；沙達特且要求以色列與「巴解」組織之間的「同時與互相」承認，他認爲，沒有該組織的參加，就無法達成巴勒斯坦自治談判的目標。以色列只同意給予巴勒斯坦人「半自治」的有限權利，旨在藉安全理由滿足其「擴大領土」的慾望，所以比金立即拒絕了沙達特的上項要求。現在，埃及新總統穆巴拉克的態度更爲強硬，他不但仍然堅持給予巴勒

斯坦人的「完全自治」權利，而且促使以色列必須將東耶路撒冷歸還阿拉伯人。這兩種條件，自然不會被比金政府所接受的。

不過，正在特拉維夫恢復中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以埃雙方均對談判前途表示樂觀。以色列電臺報導^⑰，比金總理在

註^⑯ Cairo, Egypt, Oct. 20, 1981 <UPI>.

註^⑰ Tel Aviv, Oct. 21, 1981 <UPI>.

國會外交與國防委員會議席上對此項談判將有成功的結束，表示樂觀看法，但他並未訂下最後限期。穆巴拉克總統一直竭力向以色列保證埃及對和平程序的承諾，這項和平程序是從他的前任總統開始的，所以他對此項談判也抱成功的希望。穆巴拉克對以色列記者說⁽¹⁹⁾：「如果我們能在談判期間努力獲致『自治原則』，那麼就有理由相信，巴勒斯坦人將會參加和平程序。」但是，迄今巴勒斯坦人一直斷然拒絕參加這項談判。

再就美國對和談立場與行動而言，美國在中東和談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尼克森與福特時期，季辛吉國務卿先後完成了兩次以色列自蘇彝士運河東岸撤退，以及一次自戈蘭高地的局部撤退工作，從此季辛吉的調停工作毫無進展。一九七七年卡特政府積極推展中東外交，一九七八年九月，就達成了大衛營協定，翌年三月埃及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以色列開始從西奈半島中部撤退，其餘西奈的三分之一土地（包括南端沙目錫克（Sharm el-Shiekh）戰略基地及東北部空軍基地）預定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前完全撤退。但是，第二階段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自一九七九年五月開始直至一九八〇年止，一直陷於奄奄一息的狀態。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由於卡特的優柔寡斷，不敢以行動對付比金的挑戰，結果喪失了他可能選舉為總統的機會，徒使比金由逆境中再度贏得了以色列大選的勝利。

雷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對付蘇俄為最優先，而在中東制定一項所謂「戰略一致」（Strategic Consensus）政策，以對抗蘇俄擴張在波斯灣地區的勢力，這項政策顯然忽視了中東和平談判的重要性，因而招致了沙烏地阿拉伯與約旦兩國領袖的強烈反對。他們一致認為，當前阿拉伯國家所遭受最大的威脅不是蘇俄而是以色列，所以才有法德親王的八點中東和平計劃的提出。無論將來採取何種談判方式，而以雷根必須堅定立場，有效行動迫使以色列撤出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並恢復巴勒斯坦人的權利。

現在，雷根政府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大致有四：

第一、美國出售沙烏地阿拉伯五架早期雷達警報機的問題。比金總理基於以色列本身的安全，一直堅決反對美國此項售機之舉，並且暗中指使猶太人遊說團，促使參眾兩院通過決議，阻止美國售給沙國飛機的實現。雷根政府本容忍態度，希望兩院能支持這項售機議案；但是，衆院業以絕大多數票否決了這項議案，雷根只有希望最後獲得參院的投票支持。倘若雷根的售機案遭到失敗，必然會損傷美、沙兩國關係，也會影響雷根政府的「戰略一致」政策的實現。

第二、巴勒斯坦自治談判問題。此項談判是導致廣泛解決中東問題的重要過程。如獲成功，不僅可使埃及與以色列的關係趨於穩固，同時也可使溫和派阿拉伯國家減少對大衛營協定的壓力。雷根政府之所以對以色列一再容忍的另一理由，是敦促比金政府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上，能夠採取合作與妥協態度，順利實現大衛營協定，鞏固中東安全與和平的基礎。一般認為，此項談判

註⁽¹⁹⁾ Ibid.

的成功與否，是雷根政府的「試金石」。

第三、以色列從西奈最後撤退問題。以色列從西奈全部撤退的最後限期為一九八二年四月廿四日，以色列一向對埃及的和平誠意表示疑慮，唯恐在撤退西奈之後，埃及可能會改變立場，單方面中止或廢除埃及和約。然而，穆巴拉克在沙達特遇刺後一再表示，信守埃及與各國所締結的條約，包括大衛營協定及埃、以條約；他也強調，埃及無意在以色列全部歸還西奈後採取任何新的政策。在另方面，以色列在西奈設置的若干猶太屯墾區，約有三千名的猶太移民，他們堅決反對比金政府迫使他們撤離這些屯墾區，更不惜犧牲生命來抵抗政府的命令。他們聽到沙達特被刺消息之後，愈使他們有理由堅持不放棄屯墾區的主張。他們認為，失去了沙達特就是失去了和平的保障，於是，更增加了西奈屯墾區存在的價值。

第四、黎巴嫩境內的和平問題。今年七月間黎巴嫩南部發生戰爭，以色列軍隊，在空軍掩護下，大舉進攻巴勒斯坦游擊隊據點，同時又出動空軍連日轟炸貝魯特市區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造成了數百名難民及平民的死亡；再加上以色列飛機非法轟炸巴格達郊區的核子反應爐，引起了國際輿論的抨擊，雷根政府不得不下令暫時中止對以色列武器的供應。所幸在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調停下，以色列與「巴解」組織舉行間接談判，結果達成了休戰協定，美國對以色列的武器禁運也隨之解除。但是，最近以色列飛機恢復對黎巴嫩境內的偵察，同時巴游的地面飛彈也予以還擊，雙方構成了對於休戰協定的破壞，可能引起戰火的重燃。現在就南北高峯會議之便^{②0}，雷根總統與法德王儲在墨西哥的坎肯舉行會談，就中東情勢特別是黎巴嫩問題交換意見，雷根對法德王儲努力協助以色列與「巴解」組織達成停火協議，表示非常感謝。可見美國對黎巴嫩和平異常注視。

總之，沙達特之猝然殉難，無疑地，對中東乃至世界和平是一無比的損失。雷根政府欲補救此一損失，就必須改變卡特的優柔寡斷作風，而以果決行動迫使以色列在和談中讓步，恢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利，好讓流亡的巴勒斯坦難民返回他們自己的家園，直接參與自治與自決的工作，這樣才能根除黎巴嫩的安全威脅，也唯有這樣才能獲得廣泛解決中東問題，實現真正與持久的中東和平。

註^{②0} Cancun, Mexico, Oct. 24, 1981 <AP>.